

摘要

本文企圖由社會氛圍與建築空間產生明顯轉變的日治時期1920~1930年代著手，透過擔任總督府營繕課長與台灣建築會會長的井手薰為引線，針對他所主導的三棟官方公共建築：建功神社、台灣教育會館和台北公會堂，序列化觀察其作品前後關係與轉變，納入社會文化層面之交互影響，並與相關的人物、建築相比較，進行整體性理解和分析，思考建築家如何跨越文化藩籬，由建築的學習模仿到運用、創作的過程。

井手薰在台灣這個殖民特殊場域的建築家生涯，受總督府限制下，亦須顧及台灣有別於日本的風土與文化成分，他如何回應呢？過去被人忽略的繪畫展示空間特色為何？本論文主要利用空間分析和比較的觀點，放入該建築成立的脈絡下，藉由建築與社會脈動進行整體性觀察，凸顯井手薰及其作品以往為人忽略的特點，藉此反映這些日治時期公共建築，在台灣近代建築史發展過程中的積極意義，並深化我們對井手薰和其建築作品的認識。